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基本陈列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4份见证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珍贵文献，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即实际工作计划，以下简称党的第一个决议)的俄文本、英文本。这几份泛着淡黄色光泽的珍贵文献仿佛正穿透历史的时空，向人们讲述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鸿篇伟业，述说着它们的诞生及其不平凡的意义。

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的起草过程

1921年7月23日，具有开天辟地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拉开帷幕。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等派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先后发言。马林首先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表示祝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尼克尔斯基介绍了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情况，并建议把会议情况及时间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马林还建议大会选出一个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负责起草纲领和计划。随后，代表们又具体商讨拟定了会议日程，一致同意先由各代表先行报告各地区工作状况，然后留出两天用来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再提交大会详细讨论。

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的委员会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组成。7月25日至26日，起草委员会在代表们住宿的博文女校楼上，集中精力草拟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其他代表也时不时地参与进来。两天时间并不长，代表们手边的参考文献也很有限，最主要的就是1920年12月刊行的《共产党》月刊第2期上发表的P生(即沈雁冰)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和《美国共产党宣言》。另外，李汉俊、李达还提供了几期英国共产党的机关杂志《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党刊《共产党》



(The Communist)等。由于时间紧张，代表们主要参考《美国共产党党纲》、《美国共产党宣言》、第三国际对各国共产党的要求等资料以及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要求等，想好一条就写下一条。连续两天，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反复的讨论后，代表们终于拟出了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提交给大会。

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的主要内容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文献，它旗帜鲜明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个奋斗目标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纲领明确了党的名称、任务、入党程序、党组织建设等问题，还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纲领文字简练，无论英文版还是

俄文版，共15条，包含了党纲与党章两个方面的内容。纲领第1条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第2条阐述了党的纲领，明确提出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资本私有制，最终达到没有阶级、一切生产资料悉归社会所有的共产主义。纲领第3条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为采用联合会形式组织工农劳动者和士兵，指出党的政治主张是“反复灌输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在与其他党派、黄色知识分子阶层的关系方面，采用了一种排他的激烈态度，主张“完全与黄色知识阶级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关系”。纲领第4至15条详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党的纪律、中央组织及地方组织规范等党章方面的内容。从组织上确立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党在初步发展阶段，慎重发展党员、严格履行入党手续，强调严密的组织纪律要求，对于一个刚刚诞生的政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保持党的团结统一，把党建设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有着严密组织纪律的无产阶级

级新型政党，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董必武、李汉俊撰写的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代表大会的第三、四、五次专门研究了纲领，经过一番长时间的辩论，就某些问题做出了最后决定，但是有一点除外，因它引起热烈争论。”第三、四、五次会议上，代表们没有得出任何结论。第四次会议上，辩论更加激烈，集围绕党员能否进议会当议员展开。最终，代表们达成了一个妥协性的意见：“党员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议员，但士兵、警察和文职雇员不受此种限制，为现行法律所迫或已获得党的同意者除外”，并注明“这一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留待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除了这一点

之外，纲领的其他内容都作出了决定。

与纲领规定的中国共产党的长远奋斗目标相对应，党的一大还讨论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决议，对党当前开展的实际工作任务以及开展工作的原则、方法和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决议是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当前实际工作的设想和计划，从6个方面展开，主要论述了如何开展工人运动问题，制定了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工作任务，提出了党在当前工人运动中的任务、方针、政策、方法和要求。

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的原件文本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的原件，只有俄文本和英文本，目前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展厅里展出的中文本是根据俄文本和英文本翻译过来的。

俄文本原藏于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195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达成一致，把共产国际与中共有关的部分档案交还给中

国。195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出代表团前去接收。第一批接收的档案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留下的，共有两万多件，编有俄文目录。1957年，中央档案馆组织工作人员和专家整理了这些档案。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外文档案第九卷中，工作人员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等。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英文本，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提交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1和附录2的两个文件，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陈公博的硕士论文1924年提交后，被尘封30多年，于1960年被该校图书馆管理人员发现，并由韦慕庭教授进行研究。同年，韦慕庭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长篇绪言，作为第一部分，附在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前面，作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丛书第七辑公开发表，1966年又作为纽约阿克特贡(Octagon book)版刊行。1979年该书重版。

俄文本和英文本的纲领和决议对照，内容基本相似。纲领两种文本都是15条，均缺第11条，其他14条内容要点完全相同。两种文本的第14条也都有附注，不过俄文本附注为“这一条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曾引起激烈争论”，看似不大合理，而英文本附注为“这一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决定留待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更合乎会议当时的历史情境和时间逻辑。

尽管处于初创阶段，但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自己的纲领文件中开宗明义确立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写下“劳动阶级”“无产阶级”这些字句，奠定了我们党的前进方向和基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提出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尽管纲领比较简略，尤其是没有提出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但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为中国共产党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指明了正确方向。



(上接1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这充分说明，习近平党建思想已经具有更加鲜明的理论标识、更加清晰的思想边界和更加完整的体系结构。

从理论发展规律看，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通常要经历从重要论述到系统观点、从实践经验到理论概括、从工作部署到学理表达、从内容展开到概念命名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领导、政治建设、思想建党和理论强党、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管党治党责任等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在实践中不断展开、在理论上不断深化、在体系上不断成熟，最终凝练为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具有鲜明标识的思想形态。

习近平党建思想使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获得更加鲜明的概念标识，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理论创新成果，避免将其理解为若干分散观点和具体要求的集合。它使党的建设理论的系统性更加突出，有助于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反腐败斗争等内容放到统一理论体系中把握。它为体系化研究、学理化阐释、大众化传播提供了更加明确的对象。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继承基础上的集中凝练和提升。它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但表达更集中、标识更鲜明、体系意味更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从重要思想向思想形态跃升。

战略方针更加突显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

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地位获得更加突显的体系表达。“全面从严治党”在2014年提出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后逐渐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时，明确提出“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个主线”，并将其摆在总叙述中，虽然“十三个坚持”没有把“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列为独立条目，却将它作为贯穿“十三个坚持”的统摄性主线发挥统领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党建思想明确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十四个坚持”的内容表达之中，并将其置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后。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转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容体系中的结构性表达，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承上启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位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后，又位于“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之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二是功能贯通。全面从严治党不是党的建设某一项任务，而是贯通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责任落实等各方面的总要求。三是逻辑转换。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但优势要转化为现实力量，必须依靠党的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正是把最大优势转化为管党治党实践、把党的建设要求转化为强党强国效能的重要机制。

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体现在对象全覆盖、领域全覆盖、过程全覆盖、责任全覆盖。管党治党不是管少数人，而是面向全党；不是局限于某个领域，而是贯穿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不是止于部署要求，而是贯通教育、管理、监督、执纪、问责和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从

严”，则体现为政治上从严、思想上从严、组织上从严、作风上从严、纪律上从严、反腐上从严、制度上从严、责任上从严。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战略方针，决定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它不是抽象谈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是把先进性和纯洁性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不是一般强调从严要求，而是形成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系统方案；不是单纯解决党内管理问题，而是通过强党建设保障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系统结构更加严密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使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内容体系更加严密，形成了全领域覆盖、全链条衔接、全方位发力的系统结构。“十四个坚持”，即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些内容不是简单并列，而是构成一个内在关联、层次分明的整体体系。

这一体系“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党的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离开党的领导这个根本指向，党的建设就容易被理解为一概组织管理；离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原则，党的建设就难以保证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

这一体系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党的领导要坚强有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落到实处，必须依靠全面从严治党来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既承接党的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又统摄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是把根本政治原则转化为党的建设实践体系的关键机制。

这一体系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回答的是新时代党的建设“为了谁、依靠谁、指向何处”的根本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必须长期坚持，根本上不是为了单纯加强党内管理，而是为了保证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伟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这一体系以“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要求，以思想建设和理论武装凝心铸魂，以组织体系和干部队伍建设固本强基，以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强化约束保障，以反腐败斗争清除重大风险，以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责任落实巩固长效机制。由此形成从根本原则到结构性支点、从价值牵引到实践展开、从政治统领到组织保障、从思想铸魂到纪律约束、从反腐败到制度保障、从责任落实到治理效能的完整链条。

由此可见，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容体系具有鲜明系统性。它不是把党的建设各方面简单罗列，而是把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初心使命、政治建设、理论武装、锤炼党性、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和责任落实贯通起来，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整体性、协同性和科学性。

理论品格更加鲜明

习近平党建思想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

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有理论本体，又有实践功用；既讲清根本原理，又提供实践路径；既回答“是什么、为什么”，又回答“干什么、怎么干”。

所谓“明体”，就是揭示党的建设根本道理、根本原则和根本规律。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科学思想体系，就在于它不是停留于具体经验层面，而是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体性问题。比如，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必须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什么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什么必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为什么必须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为什么必须严密党的组织体系，为什么必须加强纪律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什么必须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这些问题都不是一般工作问题，而是关系党的性质宗旨、领导地位、执政基础和使命任务的根本问题。

所谓“达用”，就是把这些根本原则和规律认识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要求和制度机制。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抽象理论，而是具有鲜明实践指向的行动指南。它不仅阐明党的建设应当坚持什么，而且明确怎样坚持；不仅提出目标要求，而且提出实现路径；不仅强调思想原则，而且强调制度执行和责任落实。

“体用贯通”，则强调理论本体与实践运用之间不是“两张皮”，而是内在统一。没有“体”，“用”就容易成为零散措施和经验做法；没有“用”，“体”就容易停留在抽象原则和口号层面。习近平党建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政治原则、组织原则、纪律要求、制度规范转化为治党强党的现实路径，使理论和实践相互贯通、相互支撑、相互促进。

这一理论品格还体现为鲜明的问

题导向和强烈的实践指向。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不是在没有矛盾和风险的环境中推进的，而是在不断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化解风险中发展的。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以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实践载体，以强党强国为战略指向，形成既立足现实又面向未来的科学体系。同时，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提供根本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深厚滋养，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提供现实基础。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来源和实践根基，习近平党建思想才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实践生命力。

总的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时代课题，明确回答新时代党的建设根本性、全局性、时代性问题；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到习近平党建思想，标志着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形成更加鲜明的思想标识和体系形态；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以“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把党的建设各领域各环节贯通起来；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理论品格，实现理论本体与实践运用、根本原则与制度机制、管党治党与兴党强党的有机统一。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标识化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形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对于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